

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的壁垒

袁 敏

来富阳参加李杭育新书《醒酒屋》的分享会,很开心。

开心一,是因为杭育是老朋友了,他的日记我基本上也是每天追着看的,看似日常生活的记录,不乏家长里短,琐碎杂事,但信息量很大,不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能让你感悟人生的林林总总。不过说实话,即便我这样一个资深编辑和出版人,我在看杭育的日记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原始的生活毛坯,有一天能演变成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杭育的高明和厉害,他在自己喜欢的泡吧生活中,睁大了一双小说家智慧的眼睛,很自然地把生活变成了小说。来之前,我还没有看到书,但已经从《江南》上读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后来又从微信上看到了杭育为自己的新书画的封面和题的书名,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对封面蛮挑剔的,但我觉得这个封面很棒,醒目,色彩鲜亮而抢眼,书名很另类、异质、有个性,我的直觉是,这本书会有市场,因为它太贴近现实生活了。

开心二,是因为我爱富阳,富阳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文有郁达夫、画有黄公望,它是浙江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富阳本土也有很优秀的当代作家和文化名人,比如麦家、方格子,比如蒋金乐。对了,还有王旭烽,我当年在《东海》当编辑时,编过王旭烽的小说处女作《人精》,写的就是富春江畔一位风流女子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这篇小说应该说在当时还是很前卫很先锋的。王旭烽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富阳生活过很长时间,富春江滋养和孕育了她最初的文学创作。当然,还有李杭育的老长官蒋增福,他是一位伯乐,李杭育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位老长官功不可没。我在《江南》任主编期间主持设立的“郁达夫小说奖”,至今已经举

办了七届,富阳也成为该奖项的永久颁奖地。富阳对文学和文化的热情,对人才的重视,让文人在这块土地上很有归属感。今天,我为富阳有眼光有魄力引进李杭育这样一位集小说家、画家、教授、学者多重身份的人才而高兴!早就知道李杭育在画《新富春山居图》,也从他的照片中看到这《新富春山居图》一点一点慢慢露出容颜。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李杭育的新书《醒酒屋》,这部作品前些日子已经在杭州晓风书屋举办过首发式了,当时因为我在四川丹巴采访,没能参加。但那次发布会上一些重量级的嘉宾已经对这部小说有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包括首发《醒酒屋》的《江南》主编钟求是。一些媒体也都关注到了李杭育的这部新作,并纷纷作了报道并给予了诸多溢美之词。所以,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大家已有的对《醒酒屋》的种种赞美,我想谈一点自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李杭育的这部新作打通了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壁垒,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文体,给我们的小说创作,或者说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文体。

很久以来,我几乎不写小说了,一是因为做了编辑和出版人,忙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一心不能二用;二是因为自己做编辑,看过太多的好小说,觉得自己没那个才华,再努力也望尘莫及。但毕竟生活中还是有许多所见所思憋不住想表达,所以这些年其实我还是没有放下笔,在主编《江南》的同时,一直在《收获》开非虚构专栏。从2006年的《重返1976》到2018年的《兴隆公社》,再到最近的《燃灯者》,数次登上《收获》排行榜,也获得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多都出书了,也都卖得挺好,但我一直很纠结,甚至常常很焦虑。为什么?因为非虚构的第一要义就是“真实”,读者比小说更追逐非虚构,也是因为它“真实”。但就是因为真实,作品中

的人物、事件、场景、时间、地点等等,都是真实的,所以经常有人会对着入座,生出种种麻烦。我在《兴隆公社》的非虚构专栏中有一篇《润谢的兰》,写的是我姐姐的同学,她文革中去北大荒,因为个子小身体弱,干不动农活,无奈之下嫁给了当地一个麻脸的农民,生下三个孩子,为了还原知青身份,让孩子回到杭州接受好的教育,提出和老公离婚,老公不肯,15岁的大女儿因为不能回杭州上学,喝农药自杀,这位女知青也因为不能回杭州,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得了肺气肿,38岁就去世了。这篇非虚构出来后反响很大,老知青家园公号转载后当天就冲上十万加。但是很快麻烦来了,这位女知青的妹妹说我侵犯了他们家的隐私,每天给我打电话发邮件,甚至说要和我打官司。我一下子蒙了,我采访过他的妹妹,很多故事细节都是她提供给我的,那说明她是同意我写的,怎么就变成侵犯隐私了呢?后来我咨询了律师,律师也仔细看了全文,说不存在侵犯隐私,这位女知青的另外两个孩子也给我写了授权书,再后来他妹妹也说因为你姐姐也是知青,和我姐姐又是好朋友,就不追究了,这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因为在非虚构的写作中,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没有这件事那么严重,但会让你无形之中有了某种束缚,而这种束缚恰恰是写作非虚构的大忌和局限。

所以,我很佩服李杭育,看《醒酒屋》,最大的感触就是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建立在非虚构基础上的,因为一直看他的日记,虽然他小说中的人几乎都换了化名,但我还是能很自然地想到对应的真人,你说是真人吧,他分明又有了艺术的加工和提炼,既让你觉得这明明就是真人真事,又让你不得不承认它还是小说,我觉得这就是非虚构进入了虚构领域,这之间的高墙或者说屏障,让李杭

育一拳头给打破了。

所谓非虚构,我的理解,就是生活中确实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时间漫长,特别无序,也许没有结局,也许有结局我们却无法看到,或者看到了却不明白这个过程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把这些记录下来,那恐怕不是文学,也不能称之为非虚构作品。作家写非虚构作品时,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漫长变得集中,让无序变得有序,让无结局也有结局也罢,都呈现出可以启迪读者的意义。

李杭育的《醒酒屋》就更高一个层次了,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个贡献。他打破了虚构和非虚构的壁垒,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按他自己的说法,原话我记不得了,大约是说,《醒酒屋》有百分之二十虚构的成分。这些成分分布在什么地方,读者可以从中去寻找、分析、体会,我最大的体悟是,非虚构的真实性可能更吸引当今更多的读者,但从某个角度看,它也容易让作者忽略甚至放弃文学创作形式的劳动,从而无法产生后天的更深层的意义。李杭育最终把《醒酒屋》定位于长篇小说,从体量分配上也许对非虚构不太公平,但从文学创作意义上来说,这是极端智慧的选择。他给自己的创作扩大了疆域和空间,看似小小的酒吧,却滚动着人世间的风云;看似吧客、吧女、酒吧老板等等各色人等之间的琐碎对话、嬉闹、调侃甚至打情骂俏,却包含着社会的人生百态、世情哲理。而且这百分之二十的虚构是隐匿的、不动声色的,小说家的笔在李杭育手里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噙哩喀喳,不露痕迹地把虚构和非虚构可能产生的隔阂,融合得天衣无缝。既让自己的表达保持最大限度的真实性,又圆润得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

(此文系作者为《醒酒屋》分享会所作)

踏歌行

窗朝花开等你来

竺 泉

窗朝花开等你来
早春许下的蔷薇花语
经夏荷秋藕的澎湃
雪中迎来冬梅的初恋
大约在雨季 相约海滩闲
风不必狂欢
雨不用徘徊
阳光带着你的斑斓
云更是捎来
薄薄的、柔柔的缠绵
海里的浪花
树上的鸟儿
也为你我点头笑颜

窗朝花开等你来
轻轻的风 柔柔的云 细雨甜甜
茫茫人间 你我牵手 遇见温暖
蓦然回首 百年光阴 千年情缘
你我不再关上
那条隔绝阳光的窗帘
让窗与花的世界同开
让我与你的生命精彩

心香一瓣

爱在细微处流淌

范泽木

快到家时,我打了个电话问母亲家门口有没有停车位。她说了声“有的”,就匆匆挂电话。许是挂得匆忙,没把话筒放好,电话并没有挂断。

只听她和父亲说:“一会儿就到了,你去拿粉干,我先煎荷包蛋。”接着,听筒里传来脚步声。

父亲有点耳背,母亲的声音不免就响了一些。“粉干拿来没?顺便拿两根火腿肠,他喜欢吃的。”我听到父亲“哦哦”的应答声,心想,这世上只有父母会一直记着你的喜好。

一会儿,锅里已经噼里啪啦地响起来。母亲道:“你把灶膛里的柴抽掉几根,他不喜欢吃煎得太老的荷包蛋,喜欢咬一口流出蛋黄的。”

我有意放慢车速,想多感受一会听筒里的温暖。“老头子,你再去看看门口有没有车位,如果没有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母亲的声音再次传来。

在父母的嘘寒问暖中,我想起小时候的情形。有一次放学回家,我故意躲在侧门口偷听。是冬天,天黑得很早,父母已经从地里干完活回家。父亲正坐在大门口洗脚,母亲照例在灶台前忙碌。

“天都擦黑了,照说得回家了。”母亲有些担忧地说道。父亲应道:“应该快到了,等会儿我去村口看看。”

“你去的时候给他带一块番薯,他肯定饿了,每次一放学回家就找东西吃。”母亲好似在数落我,又好似在心疼我。我咧开嘴想笑,心里却升腾起一股暖意。

前排屋子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声音,母亲更加焦急,催促道:“你快去村口接一接,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本想从侧门进去吓他们一跳,但临时改变了主意。我蹿到路上,装作正往家走的样子。

今天电话里的“偷听”,和小时候多么相似。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风筝,风筝飞得越远,牵挂也越长。所有父母的爱都如山间清泉,你看见时,它源源不断,在你看不见时,也从未曾间断。

西泠桥畔三画家

蔡逢衣

中国画各朝历来有四大家的说法,近代四大家则公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其中吴、黄、潘三人均为浙江人,且他们的纪念地都离开西泠桥百米开外。

从岳庙方向向西泠桥走去,隐约见临湖一尊铜像。走近一看,原来是画家黄宾虹。只见黄老先生身着长袍,头戴一顶皮帽和一副圆框的眼镜,留着胡子,手持画本和笔,面朝西湖,就在武林墓的西侧。看上去既像一个账房先生,又似乎在做笔记或画素描。

都说西湖像一幅水墨画,黄宾虹先生正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代宗师。

黄宾虹先生祖籍安徽歙县潭渡村,其父后来经商到了金华,娶当地一位方姓姑娘为妻(娘家在赫赫有名的酒坊巷),遂在浙中安顿下来。除了经营布匹,黄父也喜欢书画。黄宾虹生于金华城西铁岭头村,幼时受家庭熏陶,爱好画画和篆刻,11岁就会临刻名家印章,可以说对篆刻十分痴迷。

13岁那年,黄宾虹回故乡歙县参加童子试,名列前茅。那次,他在故里得观祖先收藏的书画真迹,尤其喜欢明代画家董其昌的山水画。黄宾虹的画风受到故乡徽州“新安画派”的影响,行家赞其“融素淡清逸与遒劲有力于一体,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

作为山水画的代一代宗师,黄宾虹的代表作有《山居烟雨》《新安江舟中作》等。著名画家李可染曾说:“中国山水画三百年来,黄宾虹一人而已。”这让我想起西泠桥另一头的绘画大师潘天寿先生,他们的塑像离开西泠桥的距离都在一百米左右,看上去十分对称。

不仅如此,两位大师一个擅长山水,兼及花鸟;另一个擅长花鸟,兼及山水。潘天寿曾言:“人们只知道黄宾虹的山水绝妙,其实他的花卉更妙。”总之,他们为浙江这片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增添了艺术色彩。

1907年,42岁的黄宾虹去上海,参加吴昌硕老先生主持的海上题襟馆活动(如今西泠印社的题襟馆,曾是吴昌硕在杭州的创作基地)。三年以后,黄宾虹出任上海艺专校长。又过了三年,吴昌硕先生担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黄宾虹也成为社员,毕竟,从儿时起篆刻便是他的挚爱。而在黄宾虹的学生中,林散之是一代书法大师。

之后,黄老先生曾一度北迁北平十余年。直到1948年,83岁的黄宾虹应潘天寿校长的邀请,受聘杭州艺专。从此他住在西子湖畔,直至90岁高龄辞世,一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如今,黄宾虹的声望持续提升,他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黄山汤口》,近年竟被竞得高价。

除了绘画和篆刻,黄宾虹先生生前还以学人和文博专家闻名,出版过《黄宾虹谈艺录》,他对传统艺术的思考让他提出“君学”和“民学”的概念。他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运用于他的山水画创作中,还从大自然中提炼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并得出结论,三角弧和三角觚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结构,同时它们又有最多的变化。

艺境



国画《甘南写生组画》(局部) 许宜石 作

《文心雕龙》与龙游

钱汉东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史学术专著,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日前,沪上召开了“《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巨著可能是在南朝梁天监初年(502年)刘勰任太末令(今龙游县)期间正式完稿的,距今已有1520年。

著名文献学者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云:“《文心雕龙》定稿应在齐末和帝中兴二年(同年四月梁武帝即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当时大文豪沈约仕齐,和帝时最为资盛。”学界泰斗饶宗颐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中认为,定稿应在梁武帝受禅之后。受禅是指新皇帝承受旧帝让给的帝位,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邹衍、冯衍、王衍时,均避讳使用梁武帝萧衍的“衍”字。由此可以推测《文心雕龙》最后定稿年代应在梁武帝时期,而刘勰这一时期在太末任职。

刘勰(约公元465年—约520年)字彦和,祖籍今山东省日照市。少时家境清寒,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回到娘家。刘勰的外公齐儒士是一位经学家,以教书为业,见到外孙勤勉好学,决意送他去研习经学。十多岁时,母亲带着刘勰到京口甘露寺,聆听高僧法颖大师讲律学,有幸结识了南朝名刹定林寺的僧祐大师。定林寺中藏

有大量佛教典籍,齐梁时的王公大臣纷纷到此听讲律令。僧祐见年幼的刘勰聪慧好学,甚是喜爱,让其协助整理佛典、编制目录、抄录群籍、撰写碑铭等。据《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在定林寺居住的十多年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佛学典籍及儒家名著,开阔了知识视野,文学功底日渐深厚,也为日后创作《文心雕龙》积累了大量素材。19岁时刘勰母亲不幸过世,其服丧期满后,恰逢朝廷下诏举人,便独自跑到当时最繁华的京城建康(今南京)定林寺寻找僧祐大师。

据说刘勰在定林寺前后完成《文心雕龙》初稿,但并未“为当时流所称”,更不可能“洛阳纸贵”。南朝看重门第阀阅,刘勰出身寒门,籍籍无名,纵有旷世惊人之作,也难以得到时人的肯定。他请教僧祐大师如何是好。僧祐认真阅读了《文心雕龙》,还为此书做了校核与修订,他为全书的文采及观点拍案叫绝。他点拨刘勰道:“何不去找沈约?”沈约是当朝丞相,与梁武帝交好,权倾朝野,也是南朝大学问家。于是,刘勰决意去找沈约,几经周折,终于呈送此书。沈约仔细阅读《文心雕龙》文稿后,推崇备至,认为其“体大思精,深得文理”。

沈约赏识刘勰的才华,遂举荐刘勰进入仕途。据《梁书·文学传》载:“天监(公元502—519年)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

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或受高僧影响,刘勰一生无妻生子,故他既无妻室之累,也无父母之挂,轻车简从,就上路了。刘勰任太末令后,践行了他在《文心雕龙》中表达的“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的初心,知行合一,廉洁奉公,不治私产,殚精竭虑,一心为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刘勰办案拒收贿赂,秉公办事,能一天办完的案子决不拖到第二天。刘勰治水成绩也很突出,他时常带着随从出城巡视衢江,察看江水的涨落。这条河流是太末县农耕灌溉的命脉,但在山洪暴发之时,也会带来水患。对于各个险要地段,刘勰嘱咐衙役派专人守望修葺,以备不测。刘勰还采取多项措施,轻徭简政、劝农桑、薄赋税,使县内风化大行,人怀自厉,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吏部考核被评为“政有清绩”,此为政令简约而不扰民,不烦苛,不增加人民负担,也包含清廉自守之意。

刘勰离任后,太末百姓扶老携幼为刘勰送行,太末城池不大,但刘勰足足走了两个多时辰才离开县城,可见他深受百姓的爱戴。就刘勰一生而言,他在太末的政绩与创作《文心雕龙》可并列为两大卓越成就,而二者是完全和谐统一的。

学界诸家对《文心雕龙》成书时间存在不同说法。著名学者陆侃如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应在天监六年定稿。牟世金教授

(著有《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赞同饶宗颐之说,认为在天监六年七月之后,他以刘勰任太末令应满三年,至天监九年为止。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刘永翔认为从避讳等问题来看,《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龙游是有关系的,虽然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刘勰的行踪来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明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他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达之人生理想,“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在任太末令时得以部分实现。刘勰认为官吏是既积极从事于政治、社会活动,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杨教授也从避讳学上推断《文心雕龙》的修订成书年代与龙游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据《龙游县志》记载:梁天监初年(502年),刘勰担任太末县令。刘勰根据沈约所提出的建议,在任职间隙完成对《文心雕龙》的重新修改和校订亦有可能。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引发了后人极大的研究兴趣,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学”,鲁迅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刘勰一生和《文心雕龙》相伴,他的《文心雕龙》也因此与龙游有了关联,为龙游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呼吁在龙游建造“文心亭”或“雕龙阁”,以纪念刘勰这位为龙游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